

静嘉堂文库藏写本《当归草堂书目》考*

石 祥

本文所要考述的《当归草堂书目》一书现收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该书首见于1930年出版的《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以下简称“静嘉堂目”)史部目录类著录:“当归草堂书目 不分卷 撰者未详 写一册。”^①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后在《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中对此书予以较详细的解题:

当归草堂书目

无序跋。

似为购收时之记录。录书名、册数,稀及版本。主要者如下:宋版《后汉书》,缺五十六卷,三十七本;《周易本义》,宋版,八本;《韦苏州集》,宋元版,四本;宋版毛跋《晋书》,五十本。

稿本(静)^②

除此以外,《当归草堂书目》既不载于明清以来诸私家书目,亦不见藏于海内外各收藏机构,可以说是孤本仅存、几乎不为人知的秘笈。《静嘉堂目》和长泽氏描述了此书的形态特征,但未能考出作者。不过,《静嘉堂目》将此书列于缪荃孙《艺风藏书记》之后,徐枋(疑为“坊”字之误)《徐氏书目》之前,可见《静嘉堂目》的编者推测此书为晚清时期的书目。再综合以长泽氏的意见,则先行研究对此书的结论为:成书于清末,作者不详,似为购书清册。那么《当归草堂书目》究竟是成于何时何人之手,记录的又是何家的藏书或购书情况呢?

一、《当归草堂书目》的形态特征

《当归草堂书目》为蓝格写本,每半叶八行,四周单边,版心下方刻“文口”两字(后一字难以辨识),右下方以墨笔书叶数。卷首题“当归草堂书目”,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外文学与文艺学学术交流史”(09AED052)的阶段
性成果。

①《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静嘉堂文库编刊,昭和五年版,第391页。

②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梅宪华、郭宝林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第143-144页。

无编撰者名氏,首叶钤“静嘉堂藏书”朱文长方印。卷前后无序跋。著录书籍不按部类,杂乱无序。每书均记书名,册数,偶标版本,但无卷数、作者。每条占一行,间有夹行挤写者。据纸色及抄写风格,应系晚清写本。

除上述特征外,另有几点颇引注目。一是此书所用格纸与用于钞刻书籍者迥异,每行分上下两栏,这是清末民初记帐簿册的样式。换言之,此书系写于空白帐册上。二是标记版本处墨迹较淡,笔迹也与他处不同,书非一时,写手亦非一人。三是部分标记版本的书名上方有红笔加圈,略加审查,则可发现加圈者版本均较好。如首叶加圈者为“《熊氏经说》通志堂本 惠栋校”,便是一个名家批校的本子。因此,凡红笔加圈即意味着被编者目为善本。

二、《当归草堂书目》编者考

由于《当归草堂书目》中没有任何内证可以直接指向具体编纂者,因此若只据上述形态特征,我们无法较《静嘉堂目》及长泽氏的结论更进一步,还是只能推测此书为晚清某氏的写本书目。但在结合了他证材料予以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此目与晚清杭州藏书家八千卷楼丁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 当归草堂为丁氏室名

杭州八千卷楼丁氏为晚清著名藏书家,主人为丁申、丁丙兄弟,其室名中最著名者即“八千卷楼”,此名源来甚久,起自其祖父丁国典^①。丁氏另一常用室名为“嘉惠堂”。丁氏因抢救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而蒙清帝嘉奖,上谕中有“洵足嘉惠艺林”之语^②,丁氏遂名其藏书楼为嘉惠堂,并于“光绪十有四年拓基于正修堂之西北隅,凡二亩有奇,筑嘉惠堂五楹”^③。

丁氏在藏书等文献活动中大量使用以上两室名。如《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印之目》^④载丁氏藏书印 61 方,其中印文中有“八千卷楼”者多至 12 方,有“嘉惠堂”者亦达 11 方。

当归草堂一名虽不及“八千卷楼”与“嘉惠堂”常用,但同样也运用于丁氏的各类文献活动。限于篇幅,以下各举一例。在出版方面,丁氏编刊有《当归草堂丛书》、《当归草堂医学丛书初编》。在藏书印中,《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印之目》载有“当归草堂”朱文小方印。在抄录书籍时,丁氏制有当归草堂格纸。如天津图书馆藏丁氏当归草堂钞本《高氏三宴诗集》使用的就是版心下镌有“当归草堂”四字的格纸。

如上述,当归草堂使用虽不及“八千卷楼”与“嘉惠堂”频繁,但也是丁氏较常使用的室名之一,而其他藏书家却未闻有同样以当归草堂为室名者。因此

①见《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后附录,清光绪二十七年钱塘丁氏刻本。

②见丁申《武林藏书录》,《武林掌故丛编》本。

③丁丙:《八千卷楼自记》,见《丁志》卷后附录。

④《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印之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辑,1951年抄本,南京图书馆藏。

从室名来看,《当归草堂书目》很可能与丁氏有关。

2.《当归草堂书目》所载书与丁氏藏书相契合

室名相合还只是间接证据,要证明某书目与某氏有关,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证实书目所载书籍与其藏书相契合。我们试以《当归草堂书目》所载书籍中标记版本者与《八千卷楼书目》、《善本书室藏书志》(以下分别简称为“丁目”、“丁志”)等丁氏藏书目录相比对,即可发现两者往往相合。

如长泽所称“《韦苏州集》宋元版 四本”,按《丁目》卷十五《韦苏州集》条下著录有“宋元刊合配本”,《丁志》卷二十四著录此本,称“此前四卷宋刊本……后六卷配元刊”。据此,《丁志》、《丁目》著录的“宋元刊合配本”当与《当归草堂书目》中“宋元版”为同一书。

又,此目首叶有“《却扫篇》影宋本”,《丁目》卷十二子部杂家类《却扫编》条下恰有“景宋抄本”。

第二叶有“《鸡肋篇》抄本 二本”,而《丁目》卷十四子部小说家类《鸡肋编》条下正有“抄本”,亦即《丁志》卷二十一所著录之“抄本”。

上举各例或钞或刻,悉与《丁志》、《丁目》著录相符。但书籍通常会有多个复本同时流传,刻本自不待言,即便是抄本,同书往往也有多个不同抄本(即便影宋抄本也是如此),但著录于书目时(尤其是《当归草堂书目》此类草目),却往往笼统称之为“抄本”而以至于莫辨甲乙。换言之,普通的刻本、抄本作为比对证据不具有排他的唯一性。就理论层面而言,我们并不能排除以下这种可能性——清末某不知名的藏家以当归草堂为名编制书目,而其藏书中也正有别的宋元版补配的《韦苏州集》、《却扫编》的另一个影宋本和别的抄本《鸡肋编》。

因此,在这种场合中更坚强、更有力的证据是名家批校题跋本,因为这类本子在版本和批校题跋者均明确的情况下具备排他的唯一性,换言之,这类本子是独一无二的。故而,以之为证据具有几乎不可动摇的效力。在笔者所掌握的有限材料中,这类证据即有三处。

此目首叶有“《熊氏经说》通志堂本 惠栋校”,《丁目》卷三经部五经总义类称“《五经说》七卷 元熊来撰 通志堂本 惠栋校”。

第二叶有“《易纂言》通志堂本 惠栋校”,此本不见载于《丁目》、《丁志》,但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八千卷楼藏书目》经部易类《易纂言》条下正有“惠校通志堂本”。

又,长泽所称“宋版毛跋《晋书》五十本”,所谓“毛跋”当指汲古阁毛氏题跋。《丁志》卷六著录有宋刊《晋书》两部,一为大字本,一为小字本,其中小字本为“王世贞毛晋宋萃马瀛藏书”,并称其“末有记云:此书为王弼洲先生所藏。贞元本唐德宗年号,印恰符先生名字,故其秘册往往摹而用之,下必继以三雅印,此属仲雅者,向曾遭割裂,想经先生改正。余全史中原本亦系宋刻,每多缺字,而此本特全,洵可宝也。湖南毛晋识。有‘毛晋’、‘汲古主人’印”云云。

由此可知,“宋版毛跋《晋书》”即为《丁志》所著录之宋刊小字本。此本也收入了《盩山书影》,毛晋跋亦影出。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卷三史部正史类《晋书》条下著录有“宋刊小字本 丁书 五十册”^①,版本及册数也与之悉合。

3. 存在的歧异点

但是《当归草堂书目》也有与八千卷楼藏书看似不符的情况。如该目第二叶有“《六书正讹》明板 五本”,按《丁目》、《丁志》,此书八千卷楼只藏有“元刊本”,为孙星衍藏书。长泽所称“《周易本义》,宋版,八本”,按《丁目》、《丁志》,八千卷楼无是书宋版,至早仅有元刊本,为朱彝尊藏书。又,长泽所称“宋版《后汉书》,缺五十六卷,三十七本”,按《丁目》、《丁志》,八千卷楼无宋版《汉书》。

不过,对此我们仍可做出合理解释。首先,本文运用的主要方法是根据诸书目版本著录的异同进行判断,但是版本记载相异并不等同于是不同的版本,因为在鉴别版本的过程中,往往会由于误判及先后鉴定结果不一,而导致实为同一版本却版本著录不同的情况出现。尤其是丁氏这样活跃于几乎整个同治光绪时期的藏书家,在数十年的藏书活动中,对部分书籍的版本鉴定结论发生变化,是很有可能的。

如《六书正讹》,《丁志》、《丁目》俱称有“元刊本”,南京国学图书馆编《盩山书影》亦将其作为元刊本收入,而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本实为明嘉靖元年于鏊刻本^②。而《当归草堂书目》原亦著录此本为“元板”,后又涂改为“明板”,但原来字迹仍依稀可辨。再证以《国学目》,此本恰为五册,与《当归草堂书目》合。又如《周易本义》也属这种情况,《当归草堂书目》著录为“宋版”,《丁志》、《丁目》及《盩山书影》均定为“元刊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则定为明刻本^③。又据《国学目》著录,此本为八册,与《当归草堂书目》恰符。

以上两书,便是版本误判与多次鉴定结论不一导致版本著录不同的实例。

至于“宋版”《后汉书》,遍稽《丁志》、《丁目》及《国学目》,也未能发现八千卷楼曾藏有版本、阙卷及册数情况与之相符或有联系者。不过在藏书过程中,会因为出借、馈赠、失窃等诸种原因导致藏书流出或损失,因此《丁志》、《丁目》并不能反映丁氏的全部藏书。此外收藏过程中的重新装订也会导致书籍册数的变化。因而,笔者认为偶有如“宋版”《后汉书》之类与他书著录不相符的情况,并不能作为影响整体判断的有力证据。

①《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刊,1948年排印本。以下简称为“国学目”。

②此本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编号457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9页。

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编号186,第47页。

综上所述,《当归草堂书目》与丁氏曾多次使用的室名一致,所载书籍在版本、册数多与丁氏藏书相符,尤其是存在着名人批校题跋本相同的情况,即便有着版本著录不一等不相符的实例,也往往能通过其他途径曲证旁白,证其为同书同本。所以笔者认为基本可以断定《当归草堂书目》的编撰者为杭州八千卷楼丁氏。

三、《当归草堂书目》的成书时间及性质

丁氏藏书活动几乎贯穿于整个同治光绪时期,那么《当归草堂书目》究竟编制于何时,进而言之,它反映的又是哪一时期丁氏的藏书情况呢?此外,该书目的具体性质又是怎样呢?若要全面研究《当归草堂书目》一书,这两个问题当然无法回避,但由于材料有限,我们在此只能略加推断。

1. 关于《当归草堂书目》成书时间的推测

由于缺乏其他有力证据,我们无法考出《当归草堂书目》的确切成书时间,只能通过丁氏使用室名“当归草堂”的情况来粗略推测。文献中首见“当归草堂”一名,时为同治三年,见顾千里临校陆贽典宋本《易林》丁丙手跋落款:“甲子春(同治三年,1864)王正月甲子日,丁丙记于沪上之当归草堂。”^①当时丁氏身处上海,系因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丁氏家族离杭避难所致。之后丁氏暂居上海,直至同治三年春返杭^②。据此可推知,当归草堂这一室名应系丁氏于离杭流寓之际,为抒发乡思而创。

但是随着丁氏返回杭州,当归草堂这一寄托故乡乔木之思的室名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也就逐渐不再使用。因此从文献材料来看,丁氏使用“当归草堂”主要是在同治及光绪初年。如《当归草堂丛书》的刊刻始于同治二年,终于同治五年;《当归草堂医学丛书》共12种,其中10种刊于光绪四年,2种刊于光绪九年。又如当归草堂抄本《定乡杂著》卷末八千卷楼主人识语回忆称:“同治七年,从邹典二家借得书农先生全集。匆匆属写官录此册。用当归草堂版格。”^③

进入光绪中叶后,丁氏使用“当归草堂”的实例就很少了。如在丁氏编刊于光绪十年后的上百种书籍中,仅有《白云集》(收入《武林往哲遗著》)使用了室名“当归草堂”。而在藏书题跋中以“当归草堂”为落款者,就笔者见闻所及,绝无实例。而前揭天津图书馆藏当归草堂钞本卷前有《高氏三宴诗集》丁丙手跋,中称:“同治二年,在沪上购得明初刊本《荆溪唱和集》,益思《高氏三宴诗》于不置。克复后,整理文澜阁残书,此本遽然未燬,急倩王韶生录之。尚用当归草堂书格也。……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丁丙谨识。”从其中“尚用当归草堂书格”一句来看,到光绪二十三年前后,丁丙本人已经长久不使用印有“当归草

①《馆藏善本书题跋辑录》,《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三年刊》,第12页。

②以上可参阅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宜堂类编》本。

③转引自《松轩书录》,《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二年刊》,第66页。

堂”室名的格纸了,因此语气中表现出了对“当归草堂”一名的久违感。

由此推测,《当归草堂书目》的成书时间应不晚于光绪初年,而很有可能成于同治年间。浙江图书馆藏丁丙著《松梦寮文集》写本有一处有趣的记载,集中所收《八千卷楼收藏书籍记》一文称:

故人周汇西,书贾也。将回杭负土,余囑其假惜字举寓搜书,计贼知书之得获也,牛腰捆负,磨集出售,零乱损残,如人之遭患难而无由完合也。火者半,存者半,间关至沪,暇略检剔,拂尘驱蠹。其中故家之收藏、耆旧之雠校,吉光片羽,愈堪宝贵,爰为录目,以识燹馀。……同治二年佛浴日书田耨夫自记。

文中称“爰为录目”,意即编制目录。此文作于同治二年,而同治初年正是“当归草堂”一名大行其道之时,那么上文所提到的编目,会不会即指《当归草堂书目》呢?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当然,目前所掌握材料还不足以让我们做出这么大胆的推测。

2. 关于《当归草堂书目》性质的推断

对于《当归草堂书目》的性质,我们可以先从其编写形式入手,进行推断。该书目的基本特点是:排列不按部类,毫无次序可言;只记书名、册数,间及版本。在明清藏书目录中,不乏著录极为简单草率的草目,甚至有只记书名,其他诸如卷数、作者、册数、版本等付之阙如的,但基本均是按部类编排的。如明代的《赵定宇书目》只著录书名、册数,而且被批评为“虽然也分了类,但类列是极不精密的”^①,但总还有部类可寻。而像《当归草堂书目》如此简略凌乱者,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确为十分罕见。就此来看,它的确不似藏书目录。但是作为购书帐而言,该书目却又没有购书日期、价格的记载,委实令人疑惑。

在此我们不妨以丁氏编制的其他购书目录与之相比对。《文澜学报》第二卷第3、4期合刊号著录有稿本《嘉惠堂新得书目》三册,称“上册记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四年所得书目,中册记壬辰、癸巳、甲午三年所得书目,下册记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四年所得书目,卷首各有丁丙手写小引”云云^②。《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7、8期合刊号卷前图版展示了该书目上册首叶的书影,并介绍称“系誊录于乌丝栏《古今图书集成》样纸上……天头又有‘8者皆善本也’之识语”。据书影展示,此书卷端题“嘉惠堂戊子年所得书目”,次行题“十一月初十日编次誊录”,第三行题“经部”,可知全书按四部分类。此外,各书只具书名、册数,间记版本,而不载作者、卷数、购书日期及价格;并于部分书籍上方标8字型符号,以表明其为善本^③。

从以上介绍可知,《嘉惠堂新得书目》在诸多特征上与《当归草堂书目》

①《赵定宇书目》前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②《文澜学报》第二卷第3、4合刊号,浙江省立图书馆,1936年,第347页。

③这一《嘉惠堂新得书目》稿本,目前不见藏于海内外任何收藏机构,已无可踪迹。

如出一辙,这也从侧面旁证了《当归草堂书目》系丁氏所编。而两书除所用格纸与标识符号略有差别外,所不同者主要在于:1.《嘉惠堂新得书目》因系年末汇录,故而可以采取四部分类,而《当归草堂书目》编排无序,恰说明它是最原始的购书登记册,随购随记,无法讲究编排次序;2.《嘉惠堂新得书目》起戊子迄戊戌(即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四年),为丁氏藏书中期的购藏记录,而《当归草堂书目》如上所考,约为同治及光绪初年的购书记录。因此,笔者认为《当归草堂书目》是丁氏早期的购书原始记录。

四、《当归草堂书目》的价值与遗留的问题点

如上考述,《当归草堂书目》记载了清末著名藏书家杭州八千卷楼丁氏早期的购书情况,因此其价值首先就在于它是原生态的购书记录。明清以来,诸家书志书目代有流传,但其购书帐册却罕有存世。对于藏书家的访书史实,研究者基本只能依靠题跋等零星材料管中窥豹。《当归草堂书目》却为我们保留了这方面的大量珍贵史料,也为研究八千卷楼丁氏提供了新的历时性材料。

其次,《当归草堂书目》中的版本标注,尤其是前后著录不一的版本记载,为研究丁氏乃至清末的版本学实践活动提供了一手史料。例如,前揭《周易本义》一书,《当归草堂书目》定为宋刻,至《丁志》《丁目》改为元刊,而经现代研究者鉴定,实为明刻本。从鉴定结果的不断更改,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丁氏在版本学鉴定中秉持了较为认真严肃的态度,勇于修正自己的误断;但另一方面,丁氏的版本鉴定功力并不十分高明,特别是在鉴定明翻宋元本时,对于版刻风格的细微变化把握得不够准确。而笔者相信此类可以为版本学史研究提供有用史料的实例,在《当归草堂书目》中远远不止这一例。

再次,《当归草堂书目》作为中国藏书家的购书簿册而流入日本,对中日书籍交流史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当然,同时它带来了问题。据《静嘉堂目》,《当归草堂书目》既非陆心源韶宋楼旧藏,之前也不藏于日本藏家,而是静嘉堂自行收购的。那么它是何时从八千卷楼流出,为何没有随丁氏的绝大多数藏书一起进入江南图书馆,而又于何时流入日本的呢?限于材料,本文对于这些问题无法回答。不过笔者相信,在《当归草堂书目》中各类有用线索和问题点肯定还大量存在,随着材料的披露,研究者肯定还会有新的发现。希望本文能作为引玉之砖,引发中外学界对这一之前几乎无人注意的孤本文献展开进一步研究。

附记: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吴格老师在访日期间,拨冗前往静嘉堂文库,为笔者拍摄了《当归草堂书目》的书影,使笔者得以从事研究,特此铭谢。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